



在华夏广袤的大地上，我们的祖先以伟大的创造力、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历尽磨难，从远古走到现代，从蒙昧走向文明。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铸成了灿烂的现代文明。

上下五千年

陶郎◎主编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灿烂文化的民族。了解祖国的过去，才能更加热爱祖国的现在和将来。追随历史的发展轨迹，触摸五千年的文明脉搏，看我国五千年的巨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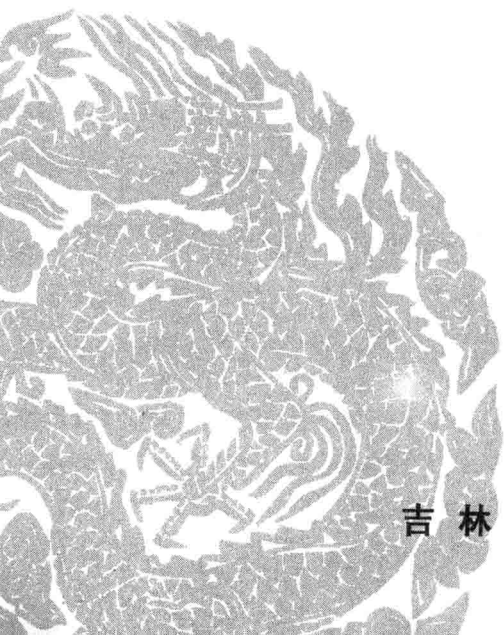


上下五千年

■ 陶郎 主编

第四卷

吉 林 大 学 出 版 社



第四卷 目录

民 国	(1)
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	(1)
国民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2)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3)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	(4)
北伐军在湖南、湖北的胜利	(5)
北伐军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胜利	(6)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	(8)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9)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	(10)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1)
马日事变	(12)
七·一五政变	(13)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13)
第二次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14)
国民党实现全国统一	(16)
南昌起义	(17)
八七会议	(19)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20)
黄麻起义	(22)
广州起义	(23)
湘南暴动	(27)
鄂中、鄂西秋收起义和年关暴动	(29)
广西百色、龙州起义	(31)
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反“进剿”	(34)
红四军第二次反“进剿”	(35)
红四军第三次反“进剿”	(35)
红四军第四次反“进剿”	(36)
中共六大	(37)
古田会议	(38)
土地革命的开展	(39)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40)
“九·一八”事变	(42)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43)
“一·二八”淞沪抗战	(44)
伪满洲国的建立	(45)
“攘外必先安内”	(46)
长城抗战	(47)
福建事变	(48)
“左”倾的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方针	(49)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50)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泛滥	(50)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的开始	(52)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作战	(53)
红军长征的胜利	(56)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70)
华北危机	(75)
“一二·九”运动	(77)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78)
对日外交日趋强硬和抗战准备	(78)
沟通国共对话以图政治解决	(79)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公布和国民大会的筹备	(80)
《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82)
红一方面军东征	(83)
红一方面军西征	(87)
两广事变和绥远抗战	(91)
西安事变	(92)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94)
卢沟桥事变	(95)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10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101)
“八·一三”淞沪抗战	(101)
太原会战	(112)
南京保卫战	(119)
徐州会战	(122)
武汉会战	(125)
日本扶植下的傀儡政权	(129)
八路军出师抗日	(129)
八路军四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130)
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131)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	(135)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139)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39)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	(140)
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	(141)
远东慕尼黑阴谋	(142)
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143)
国统区的战时财政经济措施和成就	(145)
汪精卫叛国	(146)
南昌会战和随枣会战	(147)
第一次长沙会战	(147)
桂南会战和 1939 年冬季攻势	(148)
枣宜会战	(148)
第二次长沙会战	(149)
第三次长沙会战	(150)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151)
皖南事变和第二次反共高潮	(152)
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	(153)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54)
百团大战	(155)
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	(156)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抗战	(157)
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158)
大生产运动	(159)
整风运动	(16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日、德、意宣战	(162)
《联合国共同宣言》和中国战区的成立	(163)
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的签定	(164)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165)
豫湘桂战役	(167)
中国战区军民的大反攻	(168)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根本转折	(169)
中共七大	(170)
国民党六大	(171)
雅尔塔会议与中苏谈判	(172)
美、苏对日军的沉重打击	(173)
日本投降	(174)
重庆谈判	(175)
马歇尔使华与《停战协定》	(176)



“一二·一”惨案·····	(177)
政治协商会议·····	(178)
四平保卫战·····	(180)
东北根据地的建立·····	(181)
练兵、减租、生产和土地改革运动·····	(181)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军事部署·····	(182)
内战的全面爆发·····	(183)
国民大会和《中华民国宪法》·····	(184)
国民政府再度改组·····	(185)
《中美商约》·····	(185)
国统区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	(186)
国民党的经济危机·····	(188)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	(189)
《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	(190)
十二月会议·····	(191)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	(192)
辽沈战役·····	(192)
淮海战役·····	(194)
平津战役·····	(196)
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198)
和平阴谋和南京政权的覆灭·····	(19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202)



民国

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

国共合作有力地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和工农运动的日渐高涨。但却引起了帝国主义、军阀及买办势力的仇视和恐惧，为颠覆广东革命政权，他们蓄意制造了商团叛乱事件。

广东商团成立于1912年，本是商人的自卫组织，后来被英帝国主义所操纵，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反动武装。团长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买办。1924年夏，陈向英商购买了一大批军火，违法私运入口，被广东政府查获没收。商团寻机发动叛乱。1924年10月10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庆祝双十节的游行活动，商团武装竟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商团还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叫嚣打倒“孙政府”，欲与陈炯明里应外合，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英国出动军舰，为商团助威。广东革命政府处于危机之中。中共和广东各界群众强烈要求镇压商团叛乱。10月14日，孙中山调集政府军、黄埔学生军平叛。15日，商团被缴械，商团叛乱的平定，给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商团叛乱平定后，广东革命政府仍危机四伏。各派反动军阀势力，盘踞在广东大部分地区。东江的陈炯明，粤南的邓本殷，还有与革命势力貌合神离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均拥有较强实力，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勾结，时刻准备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陈炯明的主力共6万余人，在各派军阀中实力最强，对革命政府威胁最大。1925年1月，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称“救粤军总司令”，联合江西军阀，分三路进犯广州。15日，广州留守政府决定组织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30日，东征联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三路进兵：以黄埔军校学生军和许崇智所部粤军为右路，攻淡水；桂军刘震寰为中路，攻惠州；滇军杨希闵为左路，攻河源。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右路军统领，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负责战时政治工作。2月1日，第一次东征开始。右路军勇猛进军，连克东莞、常平、平湖，11日占领深圳，肃清了“广(州)九(龙)路”敌前哨部队，然后乘胜挺进，于14日复克淡水，这时，因左、中路之滇、桂军迟不进兵，右路军实际成为东征军主力。20日，右路军占领平山，然后暂置惠州于不顾，挥师东进，在海丰农民群众支援下，先后攻克海丰、潮安、汕头等地。3月13日，右路军又与叛军激战于棉湖，虽牺牲惨重，但终于大破敌军。至23日，又攻占五华、兴宁、梅县等地，残敌逃往闽



赣边界。第一次东征击溃了陈炯明主力，胜利结束。

当东征战事方酣的时候，担负左、中路进攻任务的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却心存异志，暗中勾结陈炯明和滇系唐继尧，按兵不动，陷右路军于孤军奋战。继而又于4月间从东江撤回广州，发动叛乱，占领广州电报局、火车站和一些政府机关。6月6日，右路军奉命回师，镇压叛军。11日，在工人、农民支援下向叛军发起总攻击，仅一天半时间，全歼滇、桂军2万余人，平定了杨、刘叛乱。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是1923年3月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孙中山自任大元帅，廖仲恺、伍朝枢、谭延闿等分别担任财政、外交、内政等部长。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曾着手组建国民政府，但考虑到粤境军阀林立，大本营制易于应策，就暂时保留了这种政制。1924年7月1日，国民党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机关，指挥政府处理一切政务，从而加强了国民党中央对政府及其政策的领导和监督。因而，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对内对外都采取了积极的革命政策。

孙中山逝世前后，国民党中央再次酝酿并提出改组大元帅大本营政府，成立国民政府问题。第一次东征和杨、刘叛乱平定后，初步稳定了广州局势，政府改组工作得以实施。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改组大本营政府为国民政府，军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24日，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员及代行大元帅职权的名义，通电发布国民政府改组决议案，宣布设置国民政府掌理全国政务，以委员若干人组成，并设置军事、外交、财政各部等六项改组办法。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史称“广州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政制采用委员制，选举汪精卫等16人为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聘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同日，发表《国民政府成立宣言》，申明国民政府的职责为：“履行先大元帅之遗嘱，凡遗嘱所叮咛告语者，即国民政府所悉力以赴而期其实现者”。内外政策为：对外，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仿照中俄协定，与各国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对内，继续发起国民会议运动，“自帝国主义及军阀手中，收已失之主权，而还之国民，以符主权在民之旨”，“致中国于独立平等自由”，从而实现“国民革命的最大目的”。

国民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面大力倡导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支持民众运动，一面致力于广东的军政、民政、财政的统一，有力地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925年9月，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下，借东征军回师平定

杨、刘叛乱之机，纠集残部，重新占领东江地区，对革命力量展开疯狂的反攻。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军阀、陈的旧部邓本殷也蠢蠢欲动，企图与东江叛军相呼应，围攻广州。国民政府为彻底肃清各路叛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和南征。

9月底，第二次东征军组成。蒋介石任总指挥，汪精卫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3万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左、中、右三路作战。第一纵队为中路，以何应钦为纵队长，为东征军主力；第二纵队为右路，以李济深为纵队长；第三纵队为左路，以程潜为纵队长，总预备队为朱培德的第三军。10月1日，东征军各部相继出发，开始东征。陈炯明将其主力1万余人集中于惠州地区。惠州为东江门户，三面环水，城高墙坚，易守难攻，素称“南方第一坚城”。陈炯明企图先据险顽抗，再寻机反守为攻。为破惠州，东征军把部队分为攻城军和野战军两部分。10日，东征军扫清了惠州外围之敌。13日开始攻城。因梯短城高，数度强攻受挫，伤亡十分惨重，第二师四团团长刘尧宸壮烈牺牲，全团官兵伤亡过半。共产党员蒋先云身先士卒，虽多处受伤，仍冲锋在前。在猛烈炮火掩护下，14日，东征军终于攻克惠州。惠州之役，是第二次东征的决定性战役，歼灭了叛军主力，很快收复了东江地区，东江的收复，结束了陈炯明祸粤的历史，为平定南部军阀邓本殷创造了条件。

邓本殷原为陈炯明部属，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后，邓在南部组建高(州)、雷(州)、罗(定)、阳(阳江、阳春)、钦(州)、廉(州)、琼(州)、崖(州)“八属联军”，并于8月宣布八属自治，邓本殷表面上在孙中山、陈炯明之间保持中立，独树一帜，实则与陈沆一气，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勾结，共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第二次东征开始时，邓本殷出兵阳江，企图进犯广州，策应东江叛军。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同时南征，任命朱培德为南征总指挥，四路进兵，先后克复阳江、肇庆、廉江、廉州等地。1926年2月下旬攻克海南岛。至此，广东全省为革命势力统一。

同时，以李宗仁、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势力，在广东革命势力支持下，于1925年2月中旬歼灭旧桂系军阀沈鸿英主力。7月，又打败入侵的滇军，统一了广西全境。李、黄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两广统一案，主要内容：(1)广西政府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2)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导监督。6月1日，广西省政府成立，国民政府任命黄绍竑为省政府主席。

两广的统一，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国民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和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后方基地。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跻身于国民党中央常委之列，他一面标榜自己是“总理的唯一信徒”，一面又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极力排斥、打击共产党人，企图攫



取更多更高的权力，开始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领袖”。

1926年3月，蒋介石支持下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到处散布“共产党要暴动”的谣言，蛊惑人心。18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王柏龄、欧阳格等派人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到海军局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要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速调军舰到黄埔候用。但是，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声称并无调舰命令；蒋的爪牙则大造谣言。20日，蒋介石以此为借口，宣布戒严，断绝交通；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所；占领中山舰和海军局，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还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强令他们退出第一军。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这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反对共产党、分裂统一战线的严重挑衅事件。

事件发生后，中共两广区委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予以坚决回击；但是，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等却采取妥协的方针，按照蒋介石的要求，让共产党员退出了第一军，部分苏联顾问也被辞退回国，结果使共产党的力量受到了严重打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因被蒋介石挤压离广州出国。

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1/3；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发给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交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这是蒋介石进一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提案。对此，陈独秀、张国焘继续妥协退让，要求与会的中共代表签字接受这个提案。这样，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撤职，蒋介石、顾孟余、甘乃光分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蒋介石等右派在国民党中央占了绝对优势。不久，蒋介石又当了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开始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

1925年至1926年春，广州国民政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反革命军阀势力，实现了两广的统一，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而由“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又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强有力的群众基础。广大工农群众和爱国人士，迫切要求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国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奉直系军阀联合起来，首先在北方发动了对冯玉祥国民军的进攻，将同情北伐的国民军赶出了京津地区。而后吴佩孚又准备以湖南为基地，联合孙传芳和川、贵、滇等西南各省军阀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国民政府为了打破北洋军阀联合围攻的计划，并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决定出师北伐。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6月5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北伐动员令。4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中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这次北伐的目的和任务是：“剿灭卖国军阀之势力”，“实现中国人民的唯一之需要”，“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国民革命军共有8个军，约10万人，以蒋介石为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下属各军序列：第1军，军长何应钦，党代表缪斌；第2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副党代表李富春；第3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第4军，军长李济深，党代表廖乾吾；第5军，军长李福林，党代表李朗如；第6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第7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第8军，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

北洋军阀的主要势力有三支：一是盘踞于湘、鄂、豫、陕、冀一带并控制着京汉铁路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拥有兵力20万人；二是控制着东北各省和京、津地区及津浦铁路北段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拥有兵力35万人；三是以直系军阀分化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占据着苏、皖、浙、闽、赣5省，拥有兵力20万人。奉直军阀总计兵力75万人，但他们内部矛盾重重，拥兵自重，不能协同作战。

北伐军根据当时双方军力的对比和军阀内部的矛盾，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首先以主力攻击盘踞两湖的劲敌吴佩孚，占领长江中游；然后挥师东南，消灭孙传芳，占领长江下游；最后，在适当时机，消灭张作霖及其他军阀势力。

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在1926年7月12日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指出：“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于7月25日发表了《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和支援北伐战争。

北伐军在湖南、湖北的胜利

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第4军第10师、第12师和叶挺独立团与第7军、第8军组成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第8军军长唐生智任总指挥，分路向敌人的渌水、涟水防线发起进攻，连续攻占株州、醴陵、湘潭、宁乡等地，直逼长沙城下。叶开鑫率长沙守敌弃城向平江、岳阳退却。7月11日，在工人保安队的接应下，北伐军进驻长沙。

北伐军占领长沙时，张作霖、吴佩孚正率部队在北京西北的南口同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激烈的争夺战。长沙被攻克后，吴佩孚命令在湖南的部队依山水之



险，固守平江、岳阳一线，准备待他打下南口后，再率主力南下反攻长沙。8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第4、第7、第8军直取武汉；第2、第3军集结醴陵、攸县，警戒江西的孙传芳部队；第6军和第1军的第1、第2师为总预备队，随主力跟进。19日，第4军攻克平江，向通城进击；第7军占领浯口，向羊楼司开进。22日，第8军攻克岳阳。湘军总司令叶开鑫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率残部万余人退据湖北境内粤汉铁路上的要隘汀泗桥。

吴佩孚接到湖南守军惨败的消息后，放弃南口，亲率其主力陆军第8师和湖北暂编第4师昼夜兼程，急速南返。8月25日，吴佩孚率部抵达武汉，急调1个混成旅和1个团驰援汀泗桥。汀泗桥是鄂南门户，三面环水，一面临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吴佩孚以2万兵力凭险固守，同时调集北方部队南下增援，并策动孙传芳从江西出兵袭击平江、长沙，以切断北伐军后路。因此，国民革命军必须迅速拿下汀泗桥，以免遭吴、孙两部夹击。8月26日晨6时，第4军一部向汀泗桥发起攻击。吴佩孚将司令部设在汀泗桥后翼不远的贺胜桥，并在此亲临督战。26日激战一天，汀泗桥四次易手，反复争夺，仍无进展。27日拂晓，北伐军实施全线总攻击，叶挺独立团率先攻克汀泗桥而后乘胜追击，于27日上午又攻占咸宁城。8月30日，北伐军又向贺胜桥发起攻击，一举攻占北守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吴佩孚见败势已定，逃至汉口，据城固守，等待援兵。

9月1日，北伐军兵分3路，乘胜直逼武汉三镇。中路由李宗仁督率第1军、第4军、第7军主力进攻武昌；左路以第8军的3个师和夏斗寅的鄂军第1师进攻汉阳；右路军以第1军一部迂回进攻汉口。武昌城高地险，中路线军在进攻战斗中，打得非常艰苦。9月3日、5日两次攻城未果。敌以高墙重炮，负隅顽抗，北伐军前仆后继，死伤官兵千余人，遂改用封锁围困。在此期间，汉阳兵工厂工人在中共领导下举行总罢工，拒绝给吴佩孚制造武器。北伐军兵临汉阳城下时，守军刘佐龙师起义。6日，北伐军进占汉阳。汉口守军在吴佩孚的指挥下逃往黄陂、孝感。7日，北伐军进入汉口，并乘胜进占武胜关。吴佩孚又率部逃至河南信阳，留下刘玉春师固守武昌。武昌城被围困30余天后，守城之敌弹尽粮绝，斗志已失。10月10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内发起总攻，叶挺独立团用云梯爬城，首先攻占蛇山，突入城内。防守保安门的第3师师长吴俊卿与北伐军议降，打开保安门迎接北伐军入城。北伐军俘获守城司令刘玉春，全歼守敌2万余人。至此，吴佩孚在两湖的军队，除少数逃往鄂西和河南外，均被北伐军歼灭。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的作战遂告结束。1927年1月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正式迁往武汉，武汉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

北伐军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胜利

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采取了

隔岸观火的态度,准备坐收渔人之利。但是到了8月下旬,孙传芳见吴佩孚濒于崩溃,北伐军直接威胁到他在东南五省的统治时,也感到恐慌起来。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和策动下,孙传芳和张作霖重新调整双边关系,达成相互谅解,共同对付北伐军。孙传芳决定从苏、浙、皖调兵10万,会同驻赣部队2万余人,分两路向北伐军出击。一路布署在九江到南昌的南浔路南侧,向湘鄂边境推进,企图截断长沙至武昌的铁路;一路由瑞昌、阳新沿长江向武汉方向进攻。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后,除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武昌城外,其余兵力分为三路转攻江西。一路攻赣南,以第2军第5师和第5军第46团协同独立第1师攻占赣县(今赣州)后,沿赣江北上;一路攻赣西,以第3军和第2军的主力出击萍乡,连克宜春、万载、分宜,在新喻(今新余)与孙传芳部队激战后,分别向高安、樟树(今清江)进发。一路攻赣西北,以第6军和第1军第1师先后攻占修水、铜鼓、高安。9月19日,第6军军长程潜命第19师乘势攻占南昌,但友邻部队未能迅速跟进,又未能切断敌援军来路,孙传芳便利用南浔铁路运兵的有利条件,迅速调集主力反扑。担任侧应阻击的第1军第1师师长王柏龄不听从命令,贪生怕死,在阻敌失败后弃部出逃,第1师几乎全军覆没。占领南昌的第6军在失去侧翼掩护,遭受孙部援军的围攻下,伤亡惨重,被迫于24日退出南昌,退向奉新。10月上旬,由萍乡、新余东进的北伐军第2军主力攻占清江、丰城,第3军在南昌以西万寿宫地区歼灭孙军一部。由鄂东南进入赣西北的北伐第7军,在箬溪重创孙军1个师后,攻占德安,又形成了围攻南昌的态势。这里,由于孙军回师救援,北伐军各路又未能协同作战,德安得而复失。与此同时,第6军进攻永修失利,第3军也在乐行、乐化受挫。10月11日,第2军和第1军第2师再次攻打南昌,又遭重大损失,被迫于13日撤退。

此时,虽然北伐军在南昌进攻战斗中未获成果,但两湖战争结束后,北伐军第4军从湖北赶到江西,使北伐军的实力大增。这时,孙传芳的后方出现了极不稳定的局面。浙江省省长夏超于10月16日宣布归顺国民政府;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北伐军入闽后,孙传芳在闽部队纷纷倒戈。10月29日,北伐军攻克临川,截断赣闽通路,继续向南浔铁路沿线发起攻击。11月初,第7军再克德安,第4军攻占马回岭,两军又在德安南面的九仙岭击溃孙军两个师,截断了南浔铁路。九江、永修、乐化等地孙军见势不妙,纷纷溃逃,在滁槎附近被歼1.5万人。11月8日,北伐军再度攻克南昌。孙传芳此时在江西的主力部队10余万人,除少数逃往皖南和江浙外,绝大部分被歼灭,孙传芳本人从九江乘军舰逃往南京。蒋介石遂率北伐军总司令部进驻南昌。

在福建战场上,听命于孙传芳的福建军务督办周荫人,辖四个军共3万余人,为策应江西作战,趁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伐远征广东兵力薄弱时机,亲率大军南下,分三路进攻广东。10月上旬攻占蕉岭、松口、饶平地区,在永定设立行营。为了粉碎周荫人进攻广东的企图,何应钦指挥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和第14师主力袭击周部后方,一举攻占永定行营。此时,在北伐革命的影响下,周部占据蕉岭第2军的两个师宣布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军,配合国民革命军



其他部队夺回松口，歼灭周部的第3军，迫使周部第4军和第2军残部退往长汀。10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7军由上杭沿汀江两岸向北推进，在由赣入闽的第14军第2师配合下进占长汀。在此期间，独立第4师等部队一路北进相继占领漳州、泉州、莆田、永泰等市镇，逼近福州。12月初，自赣东入闽的第2军第6师进占建瓯，切断了闽、浙孙军的联系。孙传芳部驻闽海军起义，驻福州的1个旅投诚，国民革命军于12月9日不战而下福州。周荫人率残部逃往浙江，福建全省遂被国民革命军占领。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退守绥远一带的冯玉祥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并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总部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方针，决定首先攻取杭州、上海，击破孙传芳主力，然后会师南京。根据上述计划，北伐军编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东路军仍以第1军为主，由何应钦为总指挥，辖6个纵队，由江西东部和福建北部进入浙江，进攻杭州、上海；中路军以第3、第6、第7军为主，由蒋介石兼总指挥，下辖江右军和江左军。程潜指挥江右军3个纵队，由赣北入皖南，策应东路军作战。李宗仁指挥江左军3个纵队，由鄂东向皖北，阻止直鲁联军南下，相机夺取苏州、合肥；西路军以第4、第8军为主，由唐生智为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部分兵力巩固武汉，以第8军主力挺进豫南，控制京汉铁路南端，牵制河南之敌。另设总预备队，由朱培德任指挥官，主力在南昌，一部在九江，策应全局作战。

1月上、中旬，新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26、第19军先后在富阳和宁海之战中失利。东路北伐军为打破三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从1月27日起，由衢州兵分3路开始东进，先后占领兰溪、金华、桐庐、诸暨等地，于2月18日占领杭州，21日占领宁波。孙传芳在浙江的残部向淞沪溃逃。浙江全境为北伐军平定后，蒋介石即任命其随员担任了浙江的军政要职。继福建之后，浙江又完全被蒋介石控制。

在安徽方面，由于孙军中王普、陈调元部起义，中路军未经战斗便顺利进驻安庆、芜湖。在江苏方面，中路军的江左军由长江北岸指向临淮、蚌埠；江右军由芜湖以东分三路直取南京。3月23日，第6军攻占南京。这时东路军也进抵上海附近，同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市，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至此，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彻底溃败，残部由扬州退往淮阴、泰州一带。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了武汉。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汉成立，代行国

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1927年1月1日联席会议正式办公。

1日至3日,武汉10多万市民连续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3日下午,当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宣传队在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码头讲演时,英国水兵登岸干涉,竟用刺刀驱逐宣传队员和听讲群众,当场刺死我海员一人,刺伤几十人,制造了汉口惨案。4日在刘少奇等主持下,武汉农工商学各界200多团体500名代表举行紧急联席会议,议决对英斗争八项条件,要求武汉国民政府责令英国领事赔偿死伤同胞损失,交出行凶水兵,撤退停泊在武汉江面的英国军舰,拆毁英租界的水袋、电网,解除租界巡捕的武装,由国民政府管理租界;否则即敦请武汉政府封锁和收回英租界。当日,武汉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等宣布完全接受各界联席会议提出的交涉条件,表示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一定为人民“报仇雪耻”。5日,武汉各界400多团体30万民众举行反英大会;大会在李立三等主持下通过了联席会议的“八项条件”;会后,群众冒雨游行,冲入英租界,摧毁了租界内的沙包、电网,驱逐了英国巡捕,夺回了英租界。同日,武汉国民政府议决设立以外交部长陈友仁为主席的“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租界的一切公安市政事宜,接管了汉口英租界。

1月6日,九江也发生了英国水兵枪杀中国工人和英舰开炮挑衅事件,九江工人和各界民众几万人奋起占领了英租界,迫使英国水兵退回军舰。次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派人到九江交涉,并于10日成立了“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武汉国民政府代表陈友仁在各界人民的支持下,在与英国驻华公使阿马利的谈判中严词拒绝了对方提出的恢复租界原状的无理要求,顶住了英国政府企图调派军队来华的武力威胁,终于迫使阿马利分别于2月19日、20日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协定上签了字,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是中国人民近百年反帝斗争史上的一个壮举,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反帝斗争的进一步高涨。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在反帝斗争高涨的同时,全国工人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成为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高潮。

1926年10月,当孙传芳的主力大部投入江西战场,上海兵力空虚和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进军上海时,中共江浙区委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和夏超部被孙传芳击败,起义遭到失败。

1927年2月,北伐军先头部队到达嘉兴。上海总工会于19日组织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几天内罢工工人增加到三四十万。21日,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将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工人们同反动军警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但由于敌我力量



悬殊，进入嘉兴的北伐军白崇禧部在蒋介石命令下按兵不动，起义又遭失败。

第三次武装起义由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负责领导。周恩来和江浙区委领导人罗亦农、赵世炎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王寿华等进行了一系列十分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建立了有严密组织的 5000 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进行秘密训练，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成立起义总指挥部和各级指挥部，派人详细侦察敌情，制定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起义计划。3 月 11 日，铁路工人首先罢工，破坏了直鲁联军张宗昌运兵上海的计划。20 日北伐军白崇禧部进至上海西南郊龙华，上海守敌惶恐不安。周恩来等决定发动第三次起义。21 日上海总工会下达总同盟罢工命令，全市各行业 80 万工人立即响应，罢工迅速转入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按预定计划占领了电厂、自来水厂、电话局、电报局、火车站等要害部门，攻占了警察署和兵营。起义开始后，上海总工会曾派代表到龙华，要求白崇禧迅速攻占上海，但白崇禧继续执行蒋介石命令按兵不动。上海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经过 30 多小时的浴血奋战，于 22 日下午占领了上海市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起义胜利后，召开了由全市工、商、学各界代表参加的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委员会”，决议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这次胜利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也为世界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严重冲击着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从 1926 年 9 月上旬起，英、日、美、法等国纷纷增调大批军舰来华，企图干涉中国革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英国在华殖民利益较为集中的区域，因而，英帝国主义便成为干涉中国革命的“急先锋”。

北伐军兵临武汉时，英国便资助吴佩孚大批军火，并炮轰北伐军；9 月 5 日，又借口川军杨森扣押撞沉中国木船的肇事英轮，炮轰万县城，造成中国军民 1000 余人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1927 年 1 月，英水兵又先后在汉口、九江制造“一三”和“一六”惨案，激起中国人民反英怒涛，起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期间，英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制造“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舆论。英国政府还曾极力拉拢日、美、法等国，以图实现各国联合武力干涉。由于武汉政府采取分化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孤立、打击英帝国主义的策略。日、美、法等国从各自在华利益出发，暂时没有响应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倡导，而主要采取积极拉拢蒋介石，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和平干涉”手段破坏中国革命。

1927 年 3 月，北伐军向长江下游迅速进军，威胁到列强各国在苏、浙、沪地区的殖民利益。停泊南京江面的英、美、日舰队指挥官密订“联合警备计划”，准



备派陆战队上岸协同“保护侨民”。23日晚至24日，北伐军第二、六军攻入南京城时，直鲁联军溃兵和地痞流氓乘机大肆抢掠，劫祸波及英、美、日领事馆和外侨住宅，造成6名外国人死亡。24日下午3点，停靠在下关江面的英美军舰以此为借口，悍然炮轰南京城，造成北伐军官兵及和平居民伤亡2000余人的重大损失。这就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制造的“南京惨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于1927年3月26日一到上海，便立即和集中在那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大买办、大地主和帮会流氓头子会面，策划反革命政变。帝国主义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2万多军队帮助蒋介石，并通过租界为蒋介石提供一切便利；上海的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为蒋介石筹集了巨额资金；以黄金荣、杜月笙为首的帮会势力作出了将组织大批打手的保证。同时，蒋介石将上海、南京的一部分同情革命的北伐军缴械或调离，另调新收编的旧军阀部队进驻上海市区。4月初，蒋介石和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以及吴稚晖、张静江等召开反共的秘密会议，由吴稚晖提出“举发中国共产党谋叛呈文”，诬称共产党“叛逆有据”，要求蒋介石给以“非常紧急处置”。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当日蒋介石向汪精卫提出赶走鲍罗廷和分党两件事情。随后，汪精卫与蒋介石举行秘密会议，蒋介石等主张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制止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的成立，指使吴稚晖等人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工人起义的胜利果实；并派流氓地痞监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同时又虚伪地“担保不缴”工人纠察队的一枪一械，还给总工会送去了“共同奋斗”的横匾以麻痹群众。

在这紧急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他不但没有任何应变的精神准备，反而于4月5日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声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是“谣言”，要求革命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同蒋介石之流“互相尊敬”、“开诚合作”。这个宣言完全掩盖了蒋介石的阴谋活动，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装。

4月11日，蒋介石下达“清党”的命令。当天深夜，帝国主义军队越过租界，搜查、拘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1000多人，转交给了蒋介石。12日凌晨，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佩带“工”字号袖章，冒充工人纠察队，袭击各工人纠察队。蒋介石布置好的反动军警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了纠察队的枪械；又指使流氓、党棍占据上海总工会，查封工会组织，捕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仅工人纠察队员就死伤300多人。当天，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命令。13日，上海10多万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集会，抗议蒋介石的反动暴行；会后，群众高呼“还我武器”、“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到宝山路游行请愿，途中遭到预先埋伏在那里的蒋介石军队的袭击，当场牺牲100余人，伤无数。时值大雨，宝山路

